

本书编辑组 / 编

# 胜利 大营救

这场闻名中外的大营救

取得完全的成功

是中国共产党人创造的历史奇观

它曾被茅盾先生称之为

抗战以来（简直可以说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抢救工作

对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和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解放军出版社

广州 桂林 柳州 梧州  
桂林 书店



K265.1

H33

# 胜利大营救

本书编辑组 何小林 编  
郭际

山东省

解放军出版社

# 京新登字 117 号

胜利大营救/廖承志著.-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9

.12

ISBN 7-5065-3797-4

I. 胜… II. 廖… III. 华南抗日游击队-抗日斗争-香港-史料 N.K26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76278 号

## 胜利大营救

解放军出版社出版

(北京地安门西大街 40 号 邮政编码: 100035)

北京国防印刷厂印刷

1999 年 12 月第 1 版 199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2.625 插页: 16

字数: 280 千字 印数: 1 10000

定价: 25.00 元

# 前 言

1942年春，在沦陷后的香港，发生一件引起中外注目的大事：数百名被日军搜捕的抗日爱国文化界人士和民主人士，突然从日军的封锁下神秘地“失踪”了。几个月后，他们却安然地出现在抗日大后方和根据地。敌人为之目瞪口呆。

当时，这一大批文化界人士和民主人士，从日军刺刀下的孤岛香港，回到千里之遥的大后方，不仅山险水恶，而且有日军、伪军、国民党顽军、土匪设置的重重关卡，他们是怎样从中脱险，远走高飞的？本书辑录的当事人亲历的回忆，揭示了这个奥秘，再现了当年这场惊心动魄的胜利大营救情景。

这场规模宏大的营救行动，是在中共中央和在重庆的南方局书记周恩来的指挥下，迅速而秘密地展开的。

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美国海军基地珍珠港。就在这一天，党中央、周恩来先后两次电示我党驻香港负责人廖承志等迅速做好应变准备，将遭受国民党当局政治迫害而聚居在香港的民主人士、文化界人士，抢救出来，经广州湾（现湛江）或东江转入后方安全地区。

次日凌晨，在太平洋战争的炮声中，日军突然向香港九龙进攻。12月9日，周恩来又急电廖承志等，对文化界人士和民主人士撤离香港的路线作出明确指示：除了去广州湾、东江外，马来亚亦可去一些；如去琼崖与东江游击区则更好；不能留下隐蔽，也不能南去或到游击区的人员，即转入内地先到桂林。转息，周恩来又去电急切地询问：“港中文化界朋友如何处置？尤其九龙朋友已否退出？”“能否有一部分人隐蔽？”“与曾生部及海南岛能否联系？”此时

此刻，周恩来对身陷香港危境的文化界的同志和朋友，对爱国民主人士，是何等牵挂和焦虑！

根据党中央、南方局的紧急指示，战斗在港九的党的各方面领导人廖承志、张文彬、连贯、尹林平、梁广等，立即分头组织港九地区及交通线上各党组织和东江游击队，全力投入秘密大营救的斗争。

面对日军海陆封锁和交通工具奇缺的严重情况，营救工作主要从两路进行：一路从香港偷渡到九龙，再转移到东江游击区；另一路从香港经长洲岛偷渡到澳门或广州湾，再分别从广东境内进入桂林。此外，还有少数有特殊情况的人，则从其他路线脱险。

2月中旬，当党中央得知大批民主人士、文化界人士已安全转移到东江游击区时，即发电慰问，并同意在东江游击区设立电台与中央直接联络。与此同时，周恩来从重庆派人去桂林，接济经广州湾已到那里的夏衍等人，并请中央转告华东地下党负责人刘晓，“准备疏散一批文化人经浙江去沪转苏北”，务将“此路沿途交通情况速查告”。

当时，位于广九铁路两侧的东江游击区，范围窄小，粮少物缺，生活供给非常困难。东江游击队人不逾千，枪不过五百，又面临日伪和蒋顽的夹击，进入游击区的脱险人士，不宜在这里久留。对此，党中央、南方局和南委、东江游击队之间，在频繁的密电磋商之后，中央书记处将周恩来的意见电告张文彬。周恩来指出：一，自香港撤退的人士，大多数是统一战线的文化人，过去在渝、港均已很红了，若久住，不仅国民党特务，就是广东当局也要注意。无论如何不能停留。二，已去电方方同志，告其处理方法是：一些去浙江，经沪到苏北；一些去桂林；一些来渝。十一天后，周恩来又电示张文彬，因去沪路线情况未明，到上海的人数要减少，知名的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仍暂留游击区或梅县候电。并告知“桂林已派人去接济，可找夏衍，如夏衍已离去，可找廖沫沙（可经田汉找他）帮助”。周恩来还专门对何香凝、柳亚子、邹韬奋、张友渔、韩幽桐、胡绳、吴全

衡、于伶夫妇、章泯、戈宝权、沈志远、刘清扬等数十人的去向，分别作了具体安排。鉴于国民党特务对柳亚子、邹韬奋的缉捕很紧，周恩来倍加关注，曾专电嘱南委书记方方，要他指定专人负责接待和护送，确保韬奋、亚子等的安全。

为使营救工作进行顺利，中共中央南方局设法筹集了20万元营救费，分别汇给东江和桂林方面。并告知下一步“我们另拨款接待”。

在党中央的号令和周恩来的周密部署下，投入营救的广大党员和游击队员，把生死置之度外，将困难踏于足下，奋不顾身地与日、伪、顽、匪斗智斗勇，履险蹈危，出奇制胜地将大批的爱国民主人士、文化界人士抢救、护送到抗日大后方，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同爱国民主人士、文化界革命知识分子肝胆相照、血肉相连的亲密关系。

这场秘密大营救，历时近二百天，行程万里，遍及十余省市，共营救出抗日爱国民主人士、文化界人士及其家属八百余人。其中著名人士有：何香凝、柳亚子、邹韬奋、茅盾、夏衍、沈志远、张友渔、胡绳、范长江、乔冠华、于毅夫、刘清扬、张铁生、张明养、羊枣、千家驹、黎澍、戈宝权、胡仲持、韩幽桐、吴全衡、叶籁士、恽逸群、廖沫沙、金仲华、杨刚、徐伯昕、胡耐秋、梁若尘、黄药眠、胡风、沙千里、周钢鸣、高士其、叶以群、袁水柏、华嘉、端木蕻良、蔡楚生、司徒慧敏、司马文森、杨东蓊、张文、沙蒙、金山、王莹、章泯、宋之的、于伶、许幸之、赵树泰、李枫、蓝马、凤子、盛家伦、郁风、叶浅予、特伟、胡考、丁聪、成庆生、叶方、梁漱溟、孔德沚、沈粹镇、殷国秀、俞颂华、胡蝶等等。还有李伯球、萨空了、邓文田、邓文钊、陈汝棠、梁漱溟等。我党还营救出—批国民党军政官员及其家属，如国民党驻香港代表海军少将陈策，国民党第七战区司令长官余汉谋的夫人上官贤德、南京市长马俊超夫人等。此外，被驱入日军集中营的英国官兵和英、印、荷、比等国侨民，有近百名也在我党和游击队的帮助和救援下脱离险境。

这场闻名中外的秘密大营救，取得完全的成功，是中国共产党人创造的历史奇观。它曾被茅盾先生称之为“抗战以来(简直可以说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抢救工作”。对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这场秘密大营救的胜利，我党领导的东江游击队(东江纵队的前身)作出了重大贡献。这支部队受命后，经过严密组织，全力以赴，不畏艰难，不怕牺牲，机智勇敢地护卫一批又一批的文化人士和民主人士闯过险关，安全到达目的地，无一人受损。在当时游击区物质条件极端匮乏的情况下，指战员们千方百计克服困难，关心照顾文化人士和民主人士的生活和身体健康，受到人们深情的赞誉。东江游击队当之无愧地获得党中央的来电表扬。

今天，重温这一历史事件，对加深理解党中央爱护知识分子、坚持统一战线的政策，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无疑都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 上 篇

实施大营救



# 南方局的历史功绩

童 小 鹏

抗日战争时期，抢救香港文化人的庞大行动是在党中央、南方局的正确领导下进行的。抢救工作取得异乎寻常的成功。这是南方局的一个巨大的历史功绩。

抗战时期，有的同志不知道重庆有个南方局，只知道有个八路军办事处，这是由于南方局当时还没有公开的缘故。南方局是1939年在中央领导下成立的。当时，在香港的地方党及各个办事处都是由南方局领导，而南方局又在周恩来、董必武、博古、王若飞等的领导下开展工作。由于它出色的工作，使国民党统治区的党组织得到恢复、发展和巩固，特别是在国民党掀起反共高潮以后，在统一战线，工、青、妇、文化、教育、科学，以及争取地方势力、民主党派和国民党的爱国进步力量等方面，都做了很多工作，取得很大成绩。特别值得指出的，是抢救撤退到香港的文化人这个具有重大意义的工作。当时，香港方面的工作是以廖承志为主要领导来开展的。潘汉年、刘少文等也参与领导。他们都很好地贯彻了党中央、南方局关于抢救文化人的指示，使这场伟大的抢救行动卓有成效地完成了任务。

(谭力沛、杨锦照、陈军号、吴振威整理)

# 胜利完成党中央赋予的任务

廖 承 志

1941年12月下旬,日军占领香港不久,我们接到党中央、周恩来同志的电示:许多重要民主人士、文化界人士被困留香港。他们是我国文化界的精华,要想尽一切办法将他们抢救出来。我和广东省委、香港党组织及部队的负责人进行了研究部署。经过三个月紧张的工作,克服许多艰难险阻,从日军的严密封锁下,抢救出民主人士、文化界人士何香凝、柳亚子、茅盾、邹韬奋、胡绳、夏衍、戈宝权等七、八百人,并护送他们到达大后方。同时抢救出来的还有余汉谋夫人、国民党官员陈汝棠等,以及英、美、荷、比、印等国际友人近一百人,胜利完成党中央赋予的任务。在国内外获得好评,得到党中央的表扬。

(摘自廖承志:《〈东江纵队史〉序言》)

## 廖承志给周恩来的信

**编者注：**廖承志为营救困留香港的文化人和民主人士脱险于1942年5月在广东韶关被国民党当局逮捕。他于1942年9月28日在狱中写给周恩来(即“胡公”)的信。文如下：

渝：胡公：我于五月卅日被捕，现在太和附近的所谓青年训练所中。其中一切纸上难述。希望你相信小廖到死没有辱没光荣的传统！

其余，倘有机会，可面陈，无此机会，也就算了，就此和你们握手。

中国共产党万岁！

志

九月廿八日

# 紧急营救号令

——忆香港的一次营救斗争

梁 广

抗日战争初期，我党就有一些机构设在香港。廖承志同志所领导的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是中共中央和八路军的代表机关，有电台和中央联系。还有其他一些机构。他们外出活动，都用八路军办事处的名义，但各有各的任务。当时，我是中共粤南省委书记，杨康华是香港市委书记，市委属省委领导，两家办事机构都在九龙，是秘密的。

当时，香港云集着许多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日军占领九龙时，我们正在香港开会。参加会议的有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副书记张文彬、东江游击队政委尹林平、粤北省委饶彰风等人，还有我。战事爆发，我们几个人都在那里出不来。党的不少干部和民主人士、文化界人士、国际友人，都被困留在那里。这时，潘汉年和刘少文同志向我口头传达了党中央和南方局的紧急电报，要我们不惜一切代价抢救困在香港的民主人士、文化界人士和我党的干部。为了布置和安排整个抢救工作，廖承志、连贯、张文彬、尹林平都先后从香港偷渡至九龙，到了东江游击队；我和刘少文留下来负责香港方面的抢救工作。当时，香港党组织还没有暴露，对社情又熟悉，工作比较方便，但对上头精神了解不及时，对文化界人士的情况不清楚，而刘少文那里有电台，知道上级指示快，又掌握文化人情况。因此，我们要依靠刘少文提供上级指示精神和文化人的姓名、地

址,才能开展工作。他们也要依靠我们,才能将中央指示具体落实。

我们的任务是如何设法把民主人士和文化人士找到,把他们带到安全地点,安排好生活,准备船只将他们送出香港。那么多的抢救对象,又都隐蔽了起来,在香港沦陷之后白色恐怖的日子里,要找到他们,就象大海里捞针那样难。我们只有依靠熟悉港情的黄施民、潘柱、陈文汉等人进行单线活动。黄是香港人,还是香港市委委员,属于我一个系统的。潘原是在刘少文同志手下工作的。陈文汉是摩托车工会负责人,司机。他们每人负责联系几个骨干,那些骨干又联系几个人。那时香港市委领导下有二千多党员。我们通过骨干到各个党支部活动,把抢救任务秘密交给支部去完成。

抢救工作光靠地下党还不够,许多事要利用社会关系,依靠群众去做。特别是交通联络方面,我们想了许多办法,利用了一些老人、小孩当交通员。他们对当地情况熟悉,行动时不容易被敌人发觉,比我们好开展工作。当时,有个姑娘叫方兰,才十几岁,给我当交通员,完成任务很出色。第一次派她恢复港九交通联系时,敌人还严密封锁海峡,但她机智勇敢,通过群众帮助,终于把交通线恢复起来,对我们沟通港九两地党组织的联系,起了很大作用。

我们把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找到后,利用各种关系,及时疏散出去。大多数人主要从两条路线输送出去:一条是从西线走水路,经澳门、中山、台山、湛江等地,辗转到内地。走这条路线的,主要靠朋友和熟人帮助,只在澳门有党的交通站,通过他们的关系,回到内地。另一条是经九龙出走,由东江游击队接应和护送。和游击队的联系,主要由我负责。因为我原来也是这支游击队的领导人,而且游击队在香港设有交通站,我对他们的情况熟悉,联系工作也比较方便。

香港党组织执行党中央抢救文化人的指示,是坚定不移的,可说是不惜一切代价,许多人是冒着生命危险去完成的。例如有一次,我们叫潘柱到长洲岛去找一个国际友人,他没有找到,不知道遇到了什么意外情况,几天不回来。大家以为他被日军巡逻艇打死

了，非常焦急。后来，他克服了许多艰难险阻，终于回来了。香港有个玛丽医院，是皇家医院，在半山腰上，设备非常好，有一批影响较大的国际友人、民主人士、国民党官员、英军官员都藏在那里。敌人也知道里面有重要人物，警戒很严，不准进出。由于组织营救的人员对医院情况熟悉，想办法从下水道里进去，又从下水道里把受难者一个一个营救出来。

经过党组织和广大人民群众共同努力，终于完成了抢救任务。整个抢救工作没有发生差错。后来，中央来电嘉奖，表扬了潘柱、黄施民、陈文汉三位同志。这个电报是我向他们传达的。

（黄昌伟 黄继祥整理）

## 梁广在秘密大营救中

1941年12月7日晚上，整个香港还沉浸在灯红酒绿、纸醉金迷之中，到处一片歌舞升平。然而，几个小时之后，震耳欲聋的爆炸声惊破了人们的好梦。8日凌晨，日军为配合袭击珍珠港、中途岛、新加坡、马尼拉等美、英军事基地，袭击了香港。太平洋战争爆发了。

日军出动了以第三十八师团为主力的15000人，兵分两路，沿着青山道和广九铁路南段推进，突袭新界和九龙半岛。日军仅用了3天，就突破了英方经营了两年的防线。英军节节后退，放弃九龙半岛，退守香港岛。25日，日军攻占了香港。有几百位在全国有重要影响的著名抗日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滞留在香港，情况异常危急。中共中央非常关心这批人士的安全。早在日军进攻九龙时，中共中央南方局、周恩来先后两次电示廖承志等迅速做好应变准备，将因遭受国民党当局政治迫害而聚居在香港的民主人士及文化界人士抢救出来，经广州湾（今湛江）或东江转入后方安全地区。当时，南委副书记张文彬和梁广、尹林平、杨康华及中央驻港代表李少石、潘汉年、刘少文等正在香港开会。港战一结束，廖承志立即与他们恢复了联系，分别向他们传达了党中央的紧急指示，研究部署营救办法。大家决心，不管有多大困难和危险，都要想尽一切办法，不惜任何代价，坚决完成党中央交给的任务。形势严峻，时间紧迫，要乘日军立足未稳、情况不明之机，以最快的速度进行抢救。一场大规模的秘密营救、行动迅速展开了。经大家共同研究决定，廖承志、张文彬、连贯、尹林平等从香港岛先后偷渡到九龙，转

到东江游击队，指挥并负责安排东江沿途接应及护送工作。梁广和南方局驻港负责人刘少文，留下来负责港九地区的抢救工作。

任务明确后，梁广立即与刘少文作了分工。刘少文那里有电台，知道上级指示快，又掌握民主人士及文化人士的情况，所以，由刘少文同上级保持联络，提供上级指示精神和民主人士、文化人士的姓名、地址。梁广领导的香港党组织则根据线索将这些人士找到，然后将他们送出香港。这个任务非常艰巨，几百个抢救对象，分散隐蔽在各处，要找到他们，犹如大海捞针。有长期地下工作经验的梁广深知，只有依靠熟悉香港社情，具有各种社会关系的同志，才能完成任务。首先，他将香港各级党组织的力量集中起来，和黄施民、潘柱、陈文汉等人建立起单线联系，由他们每人负责联系几个骨干，那些骨干又联系几个党员。通过各个骨干到各个党支部活动，把任务交到各基层支部去完成。其次，是利用各种关系，依靠群众去做。尤其在交通联络方面，利用一些老人、小孩当交通员。他们对当地情况熟悉，行动不易被敌人察觉。另外，梁广还建立起水路和陆路交通线、交通站。一条路往西，经澳门、中山、台山、湛江等地，另一条是经九龙往东江游击区。和游击队的联系主要由梁广负责。游击队在香港亦设有交通站，梁广对他们很熟悉，联系工作比较方便。

抢救工作首先是要寻找和联络困在香港的民主人士、文化人士。兵荒马乱，人海茫茫，如何着手呢？潘柱想到了在《华商报》工作的张友渔和在《生活书店》工作的徐伯昕。这两位先生最熟悉文化界人士的情况。只要找到他们俩，便可能找到其他人。梁广和刘少文派人分头去寻找这两位先生。通过《华商报》和《生活书店》的员工，终于找到了他俩。这两位先生亦置个人安危于不顾，主动提出暂时不走，留下来协助寻找其他人士。在他们的帮助下，梁广等人首先找到了柳亚子女女，接着找到了何香凝、经普椿一家。邹韬奋、茅盾、戈宝权、叶以群、胡绳、廖沫沙、夏衍、千家驹、萨空了、丁聪、特伟、凤子、于伶等，也一个串一个地找到了。他们中许多人都



是数易其居，能够找到他们，难度之大，可想而知。此时，大家见面，真是喜出望外。潘柱在香港湾仔洛克道一幢楼房的二层，租了一间房作为联络点，与一些文化人接头。为了便于掩护，他特意找来一个叫“二姐”的老工人和一个小孩作“亲戚”，还请了一个保姆。梁广派三个交通员专门在港九区负责带路。

人员联络上后，立刻进行偷渡的准备工作：寻找安全地方做文化人的临时集中地点；收集化装用的渔民、难民服装；用重金租用渔民的船只，等等。为确保安全，由潘柱先试偷渡一次，与在九龙负责接应的东江游击队何鼎华、何启明、李健行等人取得联系，选择九龙红磡几处僻静地方作为登陆点，并检查了九龙几个秘密接待站的准备情况。1月9日下午，偷渡行动开始了。茅盾、叶以群、戈宝权等人换上“唐装”，扮成“难民”，由交通员李锦荣带领，混杂在难民中，绕街穿巷，尽量避开日军岗哨的检查站，拐到铜锣湾的糖街，借着暮霭的掩护，钻过一个已剪开的铁丝网，与早已等候在岸边的小艇对上暗号，小艇即刻把他们送到“海上交通站”——一条停泊在避风塘中间的大趸船。邹韬奋、胡绳、廖沫沙、于伶等人也已从其他集中点被交通员带上船。翌日凌晨三点，漆黑的海面被迷迷茫茫的大雾笼罩着，日军探照灯的灯光也像是被蒙了一层布，变得昏昏暗暗。这时候，日军的快艇已经不巡逻了，堤岸上的日军哨兵也放松了。潘柱为了等这个偷渡的好时机，彻夜未眠。他赶紧将休息待渡的人们叫醒，按照事先编排的次序，由三个交通员分别带着悄悄地爬进三只有竹席棚的小艇。趁铜锣湾出口巡逻日军换哨的机会，小艇飞快地冲向海峡，划向对岸。当天边露出鱼肚白时，小艇已到了九龙的红磡。交通员迅速带领人们爬上岸，穿过市区，到达旺角通菜街的联络点，将他们交给李健行。第一批人员偷渡成功了！接着，受困香港的大多数文化人也就这样一批又一批地救出虎口。其中，何香凝、柳亚子为重点抢救对象，梁广他们为此作了周密策划，直到何、柳两人顺利脱险。

另一批文化人士则是以香港大中华酒店为据点集中，然后由